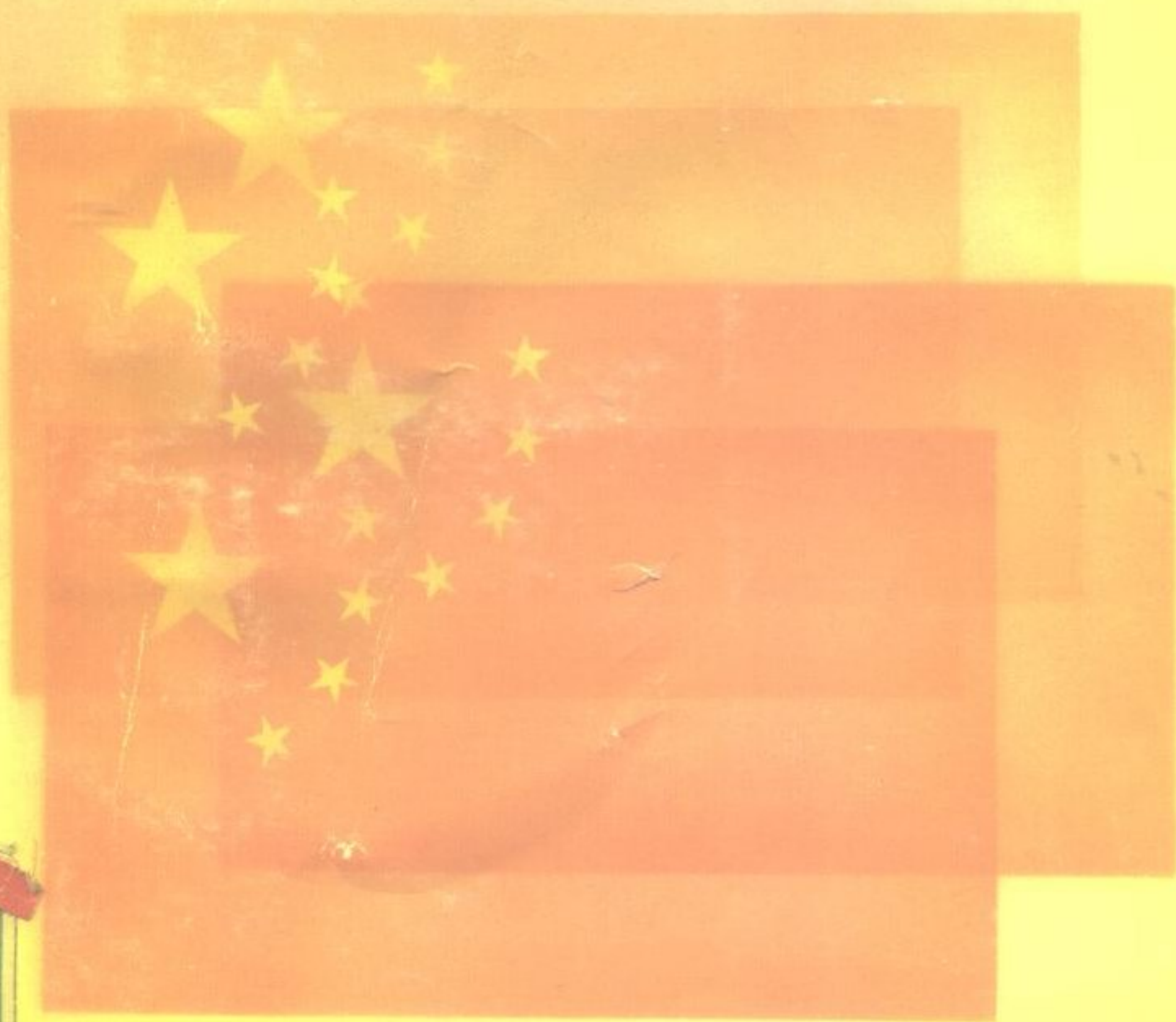


新中国 四十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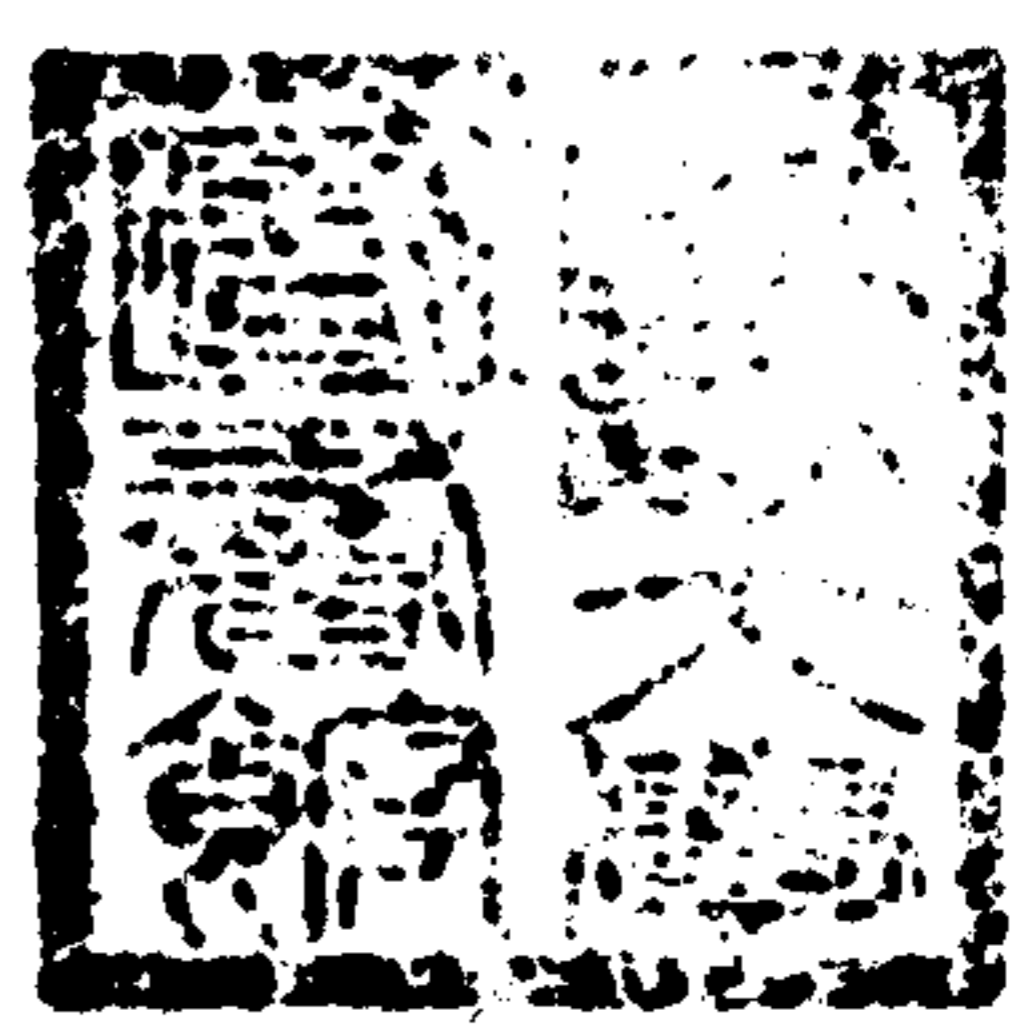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陈明显 张恒 等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52.051



新中国四十年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陈明显 张 恒 等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到198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已越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的历史面貌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后取得的。因此，研究新中国四十年年的发展史，总结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推出《新中国四十年研究》一书，奉献给读者。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党史教研室陈明显、张恒等十几位同志经过几年努力、几易其稿后写成的。它力求史实翔实和准确，论述充分和全面，是奉献给广大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大中专学生的一本较高层次的读物。书中对新中国四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作了全面的反映，特别是对当前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更作了较深的论述。

4DAS/113

新中国四十年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陈明显 张恒等编著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9.75印张 512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13-114-1/Z·3

印数：8500册 定价：8.50元

新中国四十年研究

陈明显、张 恒、程 璇、黄文安、
郭政平、于乃敏、邓琴涛、屈 动、 编著
樊天顺、于震洲、杨凤城

前 言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89年10月1日，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已越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的历史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它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①因此，研究新中国四十年年的发展史，总结在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们从1986年起开始组织编写本书，以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

新中国四十年是一部伟大而曲折发展的历史。它经历了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12月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以及1957年1月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经过这两个历史时期，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科学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等，不仅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确立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2月，是新中国四十年中经历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七年中，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跃而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一方面由于人民民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页

主专政制度的建立,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而另一方面在这短暂的时间内,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缠绕是不可能的。所以对这七年首先应当肯定,它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成就,否认这点是不对的;其次,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七年,是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的七年,是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的七年,因此必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历史的教训。党和毛泽东也有决策上的失误,不承认这点或者过分地夸大这点也是不对的。所以,为了更详细地论述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编中以较多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从1957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但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是比较落后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仍然很低。所以这只能说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称之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制度,但它保留着很多旧社会的痕迹。如何消除这痕迹,使我国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摆在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1957年以后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探索。在实践中,我国的工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和僵化的错误,使这种探索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尤其是1966年到1976年期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主义推上了极其危险的边缘。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编中,作了必要的论述和探讨。在这一编中还有不少问题也需要研究,这有待本书再版时补入。

本书的第三编,是研究和探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党的十三大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摆脱了“左”的、僵化的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努力下，逐步地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新的飞跃。因此这十年中所要研究的问题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时期毕竟离当前太近，有不少研究的课题其实践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只能择其部分作些探讨，总结经验。

对新中国四十年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和领会，有助于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执行和贯彻，也有助于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所以，在庆祝伟大的共和国成立四十年之际，我们将此书献给广大读者。

在本书的编写中，我们尽力做到史论准确、吸取各方面提供的最新成果。但由于水平有限，虽几易其稿，仍不免有缺点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是在教学中产生的，在研究的课题和作者的范围上都反映了教学的特点。陈明显负责了本书的组织和定稿，张恒负责了统编。参加编写的有（以题目先后为序），张恒为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徘徊中前进和历史性转折、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程璇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黄文安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庐山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考察；陈明显为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中苏论战、粉碎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邓小平对我国改革的重大贡献、伟大的四十年；郭政平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十年建设成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新时

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于乃敏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大跃进”运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四清运动；邓琴涛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屈动为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几次斗争；樊天顺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述论；于震洲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兴起和覆灭、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杨凤城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党史教研室

陈明显 张 恒

1988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一、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1
二、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13
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28
四、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47
五、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	60
六、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76
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95
八、粉碎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	107
九、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16
十、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35
十一、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几次斗争	155
十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68
十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184

第二编 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204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220
三、“大跃进”运动	231
四、庐山会议	244
五、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四清运动	264
六、中、苏论战	281
七、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十年建设成就	312

↓

八、“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345
九、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兴起和覆灭	368
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	388
十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414
十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	437

第三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一、徘徊中前进和历史性转折	456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475
三、新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	492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511
五、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	527
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考察	543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559
八、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575
九、邓小平对我国改革的重大贡献	599
十、伟大的四十年	613



第一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一、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一) 由不断革命论到革命转变论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的革命’。”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包含着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也包含有在社会主义时期，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以及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在革命转变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随后立即转向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权、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权逐个推倒，直到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马克思用“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来概括两个革命之间的关系，规定了无产阶级最早的战略任务。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则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愈有保证。由于资产阶级容易与旧制度的残余妥协，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作为这个革命的直接目标。他反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在两个革命之间不容许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但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

沙皇专制制度以后，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工农民主专政未能实现。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开始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921年10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用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两个革命的关系，他说：“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将上述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1939年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两个革命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既反对了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的冒险主义，又反对了在两个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从而用中国革命规律的知识武装了全党和革命人民。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论述了实现这革命转变的全部必要条件。他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4页

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 这些论述，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迅速地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二）正确地选择革命转变的时机

选择革命转变的时机对于胜利地实现革命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左”倾机会主义者曾经错误地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日，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时”，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时，就妄图实现革命的转变，实践证明这是冒险主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还证明，建立了全国政权，立即全面地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也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划分两个革命阶段的标志，这是无可非议的。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标志。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在中国，由于无产阶级把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发展为对全国政权的领导，由于没收垄断性的官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从而又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和我国实际，在建国前夕及时地提出了若干实行革命转变的政策方针。这集中反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作为建国初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的《共同纲领》中。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国家的经济命脉由人民政府掌握，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对城乡资本主义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1页

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要逐步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对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这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说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即将开始。

建国初期的革命实践，也说明了新中国建立后，革命转变已经开始。当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不少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如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把过去为三大敌人服务的经济结构通过合理调整和改组，转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轨道；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私营工业中广泛地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都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都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其他一些政治运动，尽管它们主要是同三大敌人作斗争，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等，但由于它们都直接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因而也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可见，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自然是以革命性质的转变为前提的。

建国初期的历史又证明，中国革命性质的转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尚有大量的民主革命任务亟待完成，因而还不具备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样，在建国初期，就存在两种性质的革命交错进行的复杂形势。正确

分析这种局面，稳步地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成为党的战略策略所要解决的任务。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于是一些干部以为革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将立即发生变化，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左”的偏向。如天津解放后，对资产阶级造成了惶恐不安的局面，发生了部分工厂和铺子被分了的現象。当然当时也有右的倾向，如洛阳市的工作方针曾提出以资本家是否发财，作为检查洛阳市工作的标准。但右倾不是主要的。

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写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一文，阐明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他认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們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要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也要进行必要的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在建国初期，由于当时一些干部没有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建设中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以致党内“左”倾情绪滋长，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因此，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这就是要继续集中力量打击三大敌人的势力，肃清国民党残余，完成新区土改；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要又团结又斗争，当前则强调团结，改善同他们的关

系。这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各项社会民主改革，为顺利实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战略策略方针，补充和完善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它所提出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改革”^①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同三大敌人的矛盾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革命的转变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就是实现革命转变的时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了有原则意义的改动，将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时间改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时候，即1952年底，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才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在中国之所以需要有一个革命转变的时期，是由于在全国政权建立之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尚有大量的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完成。新解放地区，即有三亿一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封建地主阶级还没有被打倒，国民党还留下了200万溃散武装，留下约60万特务分子，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这些敌对势力严重地妨碍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又出兵侵略朝鲜，侵占我国台湾，轰炸我国东北，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显然，不肃清三大敌人的势力，不打败美国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就不能巩固人民的政权，就不能进行革命的转变。因此，党中央确定以主要力量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以为全面实现革命转变创造条件。到1952年底，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已经全部完成的时候，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集中力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7页

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最后完成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

在实现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党中央正确地掌握了转变的时机。如果不明确全国政权建立以后，就应开始转变，就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并对资产阶级反限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会犯右的错误；如果过早地把主要锋芒对准资产阶级就会犯“左”的错误。如果在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后，不及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会犯右的错误；党中央正确地选择了革命转变的时机，从而顺利地实现了革命转变。

(三) 积极准备实行革命转变的力量

一切革命的胜败最终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要顺利地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必须使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对资产阶级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实现革命转变时期，党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和进行的一切经济工作，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作为中心任务。因为只有恢复经济才能改善人民生活，使新生政权得以巩固；才能对外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内制服资产阶级的反抗。在恢复经济中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组，把各种经济成份都纳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经过3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产值由1949年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4.7%，上升到56%。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由1950年的14.9%，上升到42.6%。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私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51.8%下降为39%；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批发额中所占比重由76%下降为36%，在商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由85%下降为57%。